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80年来,不断有电影去讲述和呈现中华民族经历的这场浴血抗战,很多人通过影像了解曾经的热血与硝烟。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就在枪炮的轰鸣声中,就在战争发生的当时当地,一批电影人用镜头冲锋,用胶片呐喊,用光影记录下英勇不屈的抗争。这正是《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一书所要挖掘的。

战火给中国电影业带来的首先无疑是重创。以电影重镇上海为例,“一·二八”事变让成立不久的联华天通庵制片厂全部毁于战火,开设于闸北、虹口的16家影院被炸,30余家中小公司因遭炮轰而难以为继。“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明星、联华等几大支柱电影公司被迫停产。但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中国电影也进行着艰难的转变。家国危殆的现实面前,动员民众抗日

# 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发出的闪电

——读《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

成为进步文艺的迫切使命,电影仿佛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在家庭变故中迅速成长。声音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国产电影在社会现实和思想内容的表现上有了更多可能。从无声到有声,从娱乐到担当,中国电影面貌为之一新。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3天,电影《青年进行曲》在上海公映。炮声响了,银幕亮了,影片中舍家保国的故事激励抗战斗志,有报章评论称:“我生平看电影没有如此痛快过”。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摄影师之一吴印咸回忆,在一次战斗中,他与另一成员李肃要在两个多小时内赶40公里奔赴战场,两人轮流将摄影机绑在身后骑马赶路,急速颠簸使得机器将两人背部磨伤。赶至阵地之后,李肃被敌军打了一枪,帽子上穿了一个洞。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电影人没有退缩,影像如星火般四处散播。放映队员翻山越岭,担挑肩扛放映机,脚蹬手摇发电,使很多边远地区第一次竖起了电影银幕。在陕北延安,表现三五九旅战士开垦南泥湾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时,用木棍支起幕布,放映员现场讲解,军民观众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现场掌声雷动。

电影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各类宣传方式得以创造性运用,《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一批电影歌曲发挥着冲锋号的作用,就连卡通电影也在不断升级的战火中承担起救亡抗日的使命。万氏兄弟等创作的宣传动画《同胞速醒》《精诚团结》《民族痛史》,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号召人们

团结起来,化成匕首铁拳,痛击豺狼虎豹般的侵略者。

一批海外电影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影像记录顽强不屈的中国人形象,将中国的抗战告诉全世界。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拍摄了日军对中国的入侵、陕北地区军民亲如一家的生活和民众积极参与抗战的身影。纪录片《苦干》则真实记录了重庆大轰炸,展现平凡中国人身上的英雄精神,获得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

写作《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的过程中,我们与浩如烟海的史料为伴,从泛黄纸页到斑驳胶片再到尘封档案,如同在时光的河流中淘金。珍稀影像的重现,珍贵史料的发掘,更是如同老友重逢般令人振奋。重新发现《华北是我们的》,就是一次这样的经历。

《华北是我们的》据记载是一部反映第一次反“扫荡”斗争前后晋东南根据地风貌的纪录片,在银幕上展现了真正的人民抗战。但在电影史研究领域,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已经佚失。北京、上海以及曾经放映过该片的香港,这些城市的电影资料馆均告查无此片。本书作者之一的张丹是山西人,对此耿耿于怀:“这样一部在家乡拍摄的珍贵抗战影像,不该被历史遗忘。”

转机出现了。一次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影像资料室查找资料时,张丹发现馆藏目录中有一部名为《华北风光》的纪录片,怀着一丝希望,她申请观看了这部影片。或许是持续寻找触动了时光的机关,张丹惊喜地发现,影片中

连绵起伏的山峦,呈现出典型的山西地貌;歌曲《游击队歌》,与文献所述完全吻合;那些木刻风格的字幕标语,特别是片头、片尾字幕中一再出现“华北是我们的”,更让人确信:这就是那部久寻不获的《华北是我们的》!

经过业内多位专家的论证,该片已被正名,宝贵的历史影像由此被更多人看到,一段封存的历史记忆得以接续。

除了这类影像资料的发现,我们还发掘了大量未刊档案、电影放映记录、银行借贷文件、海关进出口报表以及早期报刊材料,它们都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日本侵略者不仅妄图以武力侵占我们的国土,还利用电影进行愚民宣传,甚至通过低价倾销胶片以及资本运作等手段,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电影业,榨取商业利润,其图谋可谓处心积虑。

一部战时电影史,也是沉甸甸的抗战史,是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发出的闪电。银幕上满目疮痍的山河、浴血的同胞,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历史的电影人,仿佛在无声地警示后人:勿忘国耻!观看那些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珍稀抗战影像,总会让我们眼眶湿润。这些画面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它们不仅记录着民族的苦难,更昭示着: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守与牺牲,筑起了抗战的精神长城。

我们由衷地希望能够发现并真正读懂更多这样的影像。它们如同电影人穿越烽火岁月写给未来的一封封战地家书,每一帧都有故事,每一幕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据《人民日报》



在浩如烟海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以其独特的纪实风格和严谨的历史态度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抗战小说,它摒弃了过多的文学想象,以近乎严苛的求真精神,为我们还原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战争历史。翻开这部厚重的著作,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气息,更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此前王树增相继出版了《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每一部都大获好评,因此斩获了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查阅了近千种史料,在采集、比对、甄别的基础上,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真实,对笔下的人物都精雕细琢,力求做到有史可依、有据可查。正是这种“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写作宗旨,让王树增的每一次构思,都围绕着历史的进程展开,让他的每一次动笔,都追溯着历史的脚步而书写。正是凭着这种坚韧的态度,

王树增历时6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史诗般的巨作。

《抗日战争》属于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之一,全书共计3卷,以恢宏篇幅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场战争。作者站在全民族抗战的高度,将中国战场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叙述。书中详细记录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这8年间的重大战役和事件,包括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震惊世界的战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关注正面战场,还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敌后游击战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机智与神勇。此外,书中对一些抗日名将的刻画,也格外生动传神。左权的英勇无畏,张自忠的热血报国,都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跃然纸间,读来无不令人动容。

全书除了描写重大战争场景,还以厚重的笔触,对我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阐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智慧。书中记录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有战士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壮举,有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的义举,有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豪情。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气壮山河的全民抗战中,中国军民以付出3500万生命、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代价,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斯福总统曾评价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我们虽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侵略者的铁蹄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满目疮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给中华儿女带来了沉重的心灵创伤。《抗日战争》以纪实的手法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深切缅怀在这场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更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铭记这段历史,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战史。正如作者王树增所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共同取得的,先辈们的精神至今仍令我们敬仰,忘记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纪念这场伟大战争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正在增加,世界形势复杂而多变,地区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铭记历史,警惕历史悲剧重演。它也昭示着: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更在于精神力量的凝聚。

重读《抗日战争》意义深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并将其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让历史照亮未来,让精神永续传承,这或许就是这部史诗巨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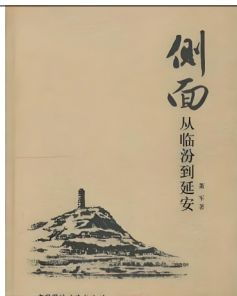
刘昌宇

## 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重读《抗日战争》



《侧面:从临汾到延安》



该书以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基于作者从山西临汾至延安的流徙经历,聚焦知识分子在战时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全书通过3篇22章旅途见闻,呈现革命根据地外围的社会环境与复杂人际关系,涵盖滞留临汾的困顿、军旅生活的矛盾及渡黄河后的社会观察。

作者希望人们思考:身处战争年代,我们应该有着怎样的一种信仰?而身处和平的年代,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历史与现实?还是那句老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书中既有与萧红分离的纪实片段,也通过民众生存状态的描写,探讨战争年代的信仰抉择与历史记忆的留存问题。附录收录作者笔记及他人回忆,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原始素材。

作者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三郎、田倪、田军等笔名发表文章。1933年与萧红出版了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4年10月间在青岛完成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后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1951年,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等作品。